[摘要] 深圳转型升级的经验为“新常态”增长做出了两个理论贡献，即专业化分工和制度创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深圳顺利实现了“深圳加工—深圳制造—深圳创造”的产业持续跨越性升级。深圳经验的核心在于，不仅重视产业分工深化中所体现的市场自我发育过程，也强调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构建一个适于企业创新与学习的环境，支持企业分工专业化的创新过程，为产业升级奠定支撑基础，从而实现增长的“新常态”。

[关键词] 转型升级 增长方式 制度创新 分工理论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4）06

[作者简介] 唐杰（1955 — )，四川德阳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

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需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常态”提出的战略背景。这种“新常态”的核心要义是指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开始向中高速换挡，中国需要在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中转变增长模式，重塑发展动力。这意味着中国需要继续释放改革红利，真正建立起有利于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才能实现经济有质量的可持续增长。

“新常态”增长的路径是什么？靠什么来支撑“新常态”的增长？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经济发展在过去30多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成功从依靠“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起家，发展成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城市，形成了“深圳加工—深圳制造—深圳创造”的产业持续跨越性升级的发展路径，最终实现了从模仿式、跟随式创新向竞争性创新、自主创新的转变。深圳转型升级的经验，为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适应经济“新常态”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其实践经验值得总结。

本文希望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转型升级实现“新常态”增长提供一个鲜活的样本。本文将主要聚焦于两个问题。第一，深圳转型发展的路径是怎样的？如何解释深圳成功摆脱依靠接受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地位，并实现产业持续跨越性升级？第二，深圳实现这种转型升级需要什么前提？或者说需要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创新才能促进转型发展？

一、深圳转型升级的路径

2013年，深圳的经济总量已达14500亿元，实现了自建立特区以来年均近24%的高速增长，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创造了一个增长奇迹。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从1979年的37.0:20.5:42.5演变为0.1:44.3:55.6，重工业比重也从11.5%提高到73.8%，并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转变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并重，再演进到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升级路径，成功走出了一条内生专业化分工推动深圳转型发展的新路。

（一）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的初次创业

几乎所有改革开放的影片都有两个镜头：一个是蛇口炸山的镜头，一个是一批青年女工从工厂骑自行车子出来。现在看到的蛇口炸山镜头并不是当初的第一炮，据说是第一次炸山时并没有想到第一炮的历史意义，几个月后，蛇口出名了，就将旁边几百米的第二炮记录了下来。那批女工是真的。她们是深圳、可能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中外合资服装厂的女工。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当时深圳服装厂的女工是从锁扣眼、缝钮扣开始服装加工的，不难想象当年的工业化水平有多低。曾任深圳海关关长的钱冠林也讲过一个有关深圳“五个一”的故事：1980年，深圳有一条街道、一个红绿灯，红绿灯下边有一个警察，全城有一个公园，公园里有一只动物，是只猴，海关抓了送给公园的。这个故事是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经济落后和城市建设滞后的真实写照，而仅仅在30多年里，深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边陲小镇到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跨越，实现了由农业经济向知识信息经济的连续跳跃，这在全球经济发展史上也是足以令人惊叹的。

深圳建特区的前五年几乎没工业，主要是贸易，很多电视剧演到改革开放后闯深圳，基本是一个套路，就是带了一大堆太阳镜、电子表、尼龙丝袜回北京。深圳真正搞工业是1985年之后。当时深圳确定了“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发展工业的方针，凭借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深圳与香港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关系，吸引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进驻，主要发展“三来一补”加工业和转口贸易。据统计，到1989年，深圳引进的6720个项目中，“三来一补”占比为56.8%。改革开放之初的这种发展模式符合比较优势理论和雁行理论的逻辑，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深圳通过集中生产更具效率或资源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进行交换，将可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深圳积极承接来自发达地区和国家的产业转移（加工装配环节），也可尽快实现经济起飞。

不过，“三来一补”、加工装配产业的附加价值低、技术含量少，且企业的产品设计、原料供应、营销管理等环节均掌握在外企手中，这种分工模式不利于深圳外向型经济的长远发展。而且，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深圳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优势也在逐渐减弱。在这种条件下，从8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有意识地引导“三来一补”企业向“三资”企业转型，后者不仅可以带来资金、设备和人才，还带来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同时还可以借助外商销售网络，扩大自产产品出口份额。通过引进外资，深圳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企业的知识溢出效应，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到1990年底，深圳的“三资”企业达3269家，“三资”企业自产产品进出口占深圳市进出口的63.8%，从而提升了深圳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档次。1985～1992年，深圳已经超过上海、天津、青岛，成为全国自行车生产与出口的老大，一跃成为包括电风扇、电冰箱、电视机在内的家电产业装备生产基地。随着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项目更多投向特区外或深圳周边地区，特区内的企业则逐渐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方向发展，深圳经济逐渐进入第二阶段的转型发展。

（二）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4年：从“特区不特”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1995年是深圳历史上的重要节点，当年上半年深圳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大滑坡，一时间成为全国新闻媒体报导的热点。与此同时，由于深圳经济特区政策走向普惠化，学界和民间产生了特区不特的争论。回头看，这个重大节点主要是城市发展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深圳经过几年探索，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艰难时刻开始全面转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当然，深圳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当时从内到外信服的人并不多。然而事实却是，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转型升级路径提升了深圳制造业的层次，增强了深圳经济发展的动力，使深圳经济转型发展再一次走到了全国前列。这一时期，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优势传统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使深圳经济总量保依然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九五”和“十五”时期，GDP平均增速仍达到16%，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从1995年的225.8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2480.6亿元，年均增长34.9%。

这个时期，深圳在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等产业领域形成了一批在中国乃至全球都有一定影响力的重点产品。在计算机及软件产业中，硬盘驱动器、硬盘磁头、计算机板卡、打印机的年产量分别占到全国的95%、90%、70%和42.9%，居中国第一，硬盘磁头产量居世界第三；通信产业中的程控交换机占中国年产量的31.5%，光纤光缆列中国第三；微电子及基础元器件产业中的液晶显示器、电容器、激光拾音头排中国第一；视听产业中的彩电产量高占中国的20.4%，出口量居全国第一；还有集装箱、注塑机、压铸机、微电机、模具、智能登机桥等一系列产品产量居世界和全国前列，“深圳制造”的影响力举世瞩目。

其中，处于当今国内电子信息产业龙头的华为与中兴，他们是从20多年前的小型贸易公司，转型为开发酒店用三五百门程控交换机而发展壮大的。华为进行万门系统开发，对当时垄断中国大陆市场程控交换机生产的美国贝尔公司构成了直接挑战。程控电话从进入中国家庭，到电话初装费用大幅下降，再到最终取消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1996年朱镕基曾亲自到华为视察。在1999年首届高交会开幕式上，朱镕基总理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每年在深圳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其中，还特别讲了华为的高级副总裁，万门交换机开发的负责人只有28岁。背后的故事是，朱镕基不仅高度关注深圳的创新，也敦促上海学习深圳的经验。后来，上海市人事局来深圳做了两个月的调研，提交了一份报告，结果认为从人数上看，深圳相对于上海完全没优势，深圳技术职称人数加起来没有上海副高以上的人数多，深圳副高以上职称的人数甚至不比上海的院士多。当时这位科学家出身的领导人说，我是院士。的确，当你从事的创新经历20年时光，仍然被证明是有价值时，你就是院士了，但背后的深层含义却是，创新永远是青年人从事的事业。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尽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华为、中兴等高科技企业在持续高速成长，但仍然处于模仿式、跟随式创新时期。OEM代工生产是深圳产业的代表形态，全球代工巨人富士康集团在深圳达到了全盛时期50余万人的规模，代工出口产品在国外市场虽印着“Made in China”的标识，但实际上是“Assembled in China”（中国装配）。除了代工外，深圳还有另一个标志“山寨”。有人戏称，什么是山寨？山寨就是Made in SZ（Shenzhen），这是一种没有核心竞争力，简单模仿著名品牌的制造方式。如何成功实现由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的及时转身，成为深圳进一步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课题。

（三）2005年至今：从“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的跨越

从2005年开始，深圳面临土地有限、资源短缺、人口不堪负重、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四个方面的“难以为继”，代工生产制造业已无法为深圳经济带来充足的动力，深圳迫切需要再一次对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调整和改革。深圳有一家叫赛意法的著名集成电路封装厂，顾名思义就是意大利法国合资的跨国公司在深圳的分公司。意法半导体公司在全球有13个工厂，除欧洲那个厂外，深圳赛意法的工资水平5年之前在12个厂中排名，曾经是倒数第二，5年以后已经上升为正数第一。这仅是管中窥豹，但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是不争的事实，其决定了我们依靠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潜力越来越小。现在的问题是要将便宜变成贵，贵了还能占领国际市场，因此就靠高性价比，靠质量、靠创新。

出人意料的是，深圳在过去10年不仅完成了从装配向制造的转变，而且创新驱动已成为深圳产业发展的“新常态”，代工与山寨早已不再是深圳的象征。深圳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从2005年的4885.26亿元提高到2013年的14133亿元，年均增长14.2%，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重已达60%以上，实现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工业结构。与此同时，出口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1690.18亿美元，占深圳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一半，达55.3%，而“三来一补”贸易出口比重已降到2.5%。

数据来源：《深圳统计年鉴》

图1 1999～2013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情况

到目前为止，深圳已经诞生了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研祥、华大基因、大疆科技、柔宇科技等一批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而且还造就了海量创新性小企业。深圳的4G技术、基因测序分析、超材料、新能源汽车、3D显示等具有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已居世界前列。作为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2013年，深圳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0049件，占全国比重48.1%，持续十年居全国首位，大大超过了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云集而著名的北京和上海；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专利申请量占全球超材料领域的85%以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在LTE技术领域的基本专利占全球的1/5，深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迅速提升。这些都证明了20年前深圳开始的向着高科技的转型已经成功，深圳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转型，即从“制造”走向“创造”。

这里，讲个高科技企业的故事。华大基因（BGI）7年前年来到深圳时只有七八个人，现在则拥有了5000人和超过全美国总和的基因测序能力。上世纪90年代美国牵头用37亿美元，100多位科学家，用13年完成了第一个人类基因图谱的测序。现在，华大基因测序能力有多大？简单说是两个两万，每月两万人、每人两万元。我们有理由大胆预测，10年之后，我们去看病不用带病例、不用带放射成像片子，带个U盘把基因图谱显示出来就行了。去年华大基因院长，37岁的著名科学家王俊被评为全球年度科学家。他为何得奖？他解释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三高生成的原因。现代医学对于三高只可以控制，不可以根治，原因是不知道三高到底是如何产生的。王俊假设，三高与人体2800种肠道微生物有关系，用基因测序的方法比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与肠道微生物的关系，结果发现三高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肠道微生物菌群，治疗三高的核心在于平衡肠道微生物。他的研究理所应当地在世界生物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说一句大白话，王俊的研究证明了广东人按季节变化喝不同的汤是有内在的科学道理的。这就是从“制造”转向“创造”。

深圳的自主创新不仅体现在高速增长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在传统产业领域的创新也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深圳服装业的发展从钉纽扣、缝袖子起步，30年以后已经成为占居我国女装生产半壁江山的时装基地。服装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PAC可编程序控制、数字式喷射印花技术、计算机测色配色等最新技术的应用，加上数量可观的时装设计队伍更大大增强了服装企业品牌开发与产品设计水平和生产能力，并完成了从传统的OEM 到ODM，最后到拥有自主品牌与技术和拥有细密分工合作关系的时装产业的重大转型。深圳还是国内第一个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设计之都”称号的城市，拥有各类工业设计机构近5000家，深圳设计获全球最顶尖设计大奖“红点奖”和“IF大奖”已达百项。

二、深圳转型升级的支撑

制度创新是深圳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对技术创新具有深远影响。制度创新是一个企业、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通过调整制度来安排和协调经济主体利益关系，可以有效刺激和规范各类经济主体行为，为经济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这意味着，好的制度可以降低技术创新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提高创新的激励，为技术创新提供基础性保障，而技术创新则会为产业升级提供转换的动力，反过来，产业的进一步升级会要求突破一些束缚改革滞后的制度，释放新的活力。深圳通过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和产学研一体化制度等多个方面的制度创新，构建了一个有利于企业创新与学习以及技术成果产业化的综合投资环境，为培育与规范有利于技术创新的高级市场经济形态打下坚实基础，使深圳由一个科技匮乏的小镇快速演变成一个创新活动原创化、规模化发展的科技城市，实现了创新模式由模仿式、跟随式创新向竞争性创新和源头创新转变。

图2 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关系

（一）市场制度

完善的市场机制是激励创新、增强经济活力最重要的制度保证。市场机制有三个核心功能。其一，市场经济可提供合理的激励机制，市场和计划经济是完全不同的，计划经济是没有激励机制的，市场化条件下，企业获取最大化的收益是激励机制。其二，市场是信号发现机制，当大家说计划经济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经济机制设想时，实际上是说，没有一个人或是一个机构组织可以完整地的搜集所有有关资源配置的信息，当你不可能搜集完整信息或者是以极高成本搜集部分信息的时候，全面的经济计划本身就是个悖论。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角度上都可能发现一部分可能不完善、可能不准确，但可能是有用的信息。这些信息会产生创业创新的激励，并激励企业与个人去发现新的信息。其三，市场机制是一个可衡量可考核的机制，资源配置是不是有效？你获得的信息是不是准确？最后一定会反映在产品市场价值上。

深圳得改革开放之先，率先在国内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这对深圳的创新发展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比如，深圳率先在国内进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把土地的国家所有权与具体经营者的使用权分离开来，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实行招标、拍卖制度；全面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现住房商品化；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构建和完善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监督与运营体系；在金融方面，引进一批外资银行，创办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区域性股份制银行，突破阻力大胆创建股票交易市场；建立以国际市场为导向、按国际惯例办事、根据市场机制运行的外贸体制，形成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对外贸易体制和组织形式；较早创办了“人才大市场”，面向全国，实现人才自由聘任和自由流动。通过前后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深圳逐步建立并完善了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信息市场等要素市场体系，深圳所具有的特定空间为国内外的商品、劳动力、资本、企业、技术等生产要素提供了一个自由流动、相互结合、嫁接的场所和舞台，为市场机制在创新活动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关键保障。当然，市场机制需要有法制化来保障，在法制脆弱的环境下，生产要素将难以积累，经济和创新活动更会受到无效率的困扰。

深圳政府还积极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体系，先后进行了8次机构改革和4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审批事项由1091项压缩到391项，不断提升政府服务的整体效率。与此同时，深圳政府的财政性资金从竞争性和盈利性领域退出，而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项目建设，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深圳政府就把自主创新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交给企业主体，并加快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服务功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转而成为自主创新环境的建设者，这也成为了深圳成功实现创新驱动的关键。

（二）企业制度

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还需要有充满活力的企业，否则政府营造的发展环境再好也可能事倍功半。深圳在企业制度方面鼓励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知识产权资本化，推动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技术进步机制、内部监督和约束机制，使企业得以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壮大发展。

首先，深圳政府致力于产权制度的改革。在许多竞争性行业中，公有制普遍采用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方式，深圳还建立了一批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私营资本、外资资本相互参股的股份制企业，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实现了企业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分离，建立并完善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第二，深圳致力于推动知识产权资本化，提高企业技术开发的激励性。知识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保护并盘活知识产权市场是撬动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的重要保障。深圳建立了无形资产评估、技术入股、科技人员持股经营、企业技术秘密保护等制度、法规，形成了以保护知识产权为核心、与国际惯例接轨、激励相容的分配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第三，深圳政府还致力于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早在90年代中期，深圳市将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战略重点时，就认识到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创新创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在研究开发、人才引进、税收优惠、投资担保、技术入股等多个方面给予支持，确保中小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与进步的重要力量。

（三）创新体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提出了要发展高新技术从产业，但是深圳几乎没有什么大学或研究机构，深圳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政策洼地”吸引人才向深圳集聚。由于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批高科技企业创业成功，深圳因市场化改革形成了更适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洼地”，当时大量在内地无法自主发展的研究机构、技术开发人员纷纷南下深圳创办电子信息企业，在整个90年代，形成了数十万科技人员南下的大规模创新资源转移。

二是深圳积极构建了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体系。如果说这批创业者的到来启动了深圳科技创新的马达，那么深圳构建的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官产学研资介紧密结合的比较完整的自主创新体系，则是维持深圳持续创新的不竭动力。建立创新体系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几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克服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降低创新企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提升企业科研投入和动力；其二，建立技术转化市场，衍生和孵化高科技企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其三，增加专业化劳动力的数量和种类，为分工深化和细化打基础。

2013年，深圳新认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591家，累积超过3000家；新增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公共技术平台等创新载体176家，累积955家；社会研发投入突破500亿元，占GDP比重提高到4%，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深圳在科技创新领域实现了“4个90%”现象，即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高新区创业创新环境进一步优化，已形成国际科技商务平台、创业投资服务广场、虚拟大学园、深港产学研基地、国家集成电路设计深圳产业化基地等服务机构在内的相对完整的创新创业服务链条。

科技人员和专业人才资源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大中型企业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从2005年的5.72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25.7万人，增加了3.5倍。到2013年末，深圳全市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21.63万人，其中具有中级技术职称及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39.21万人，到2013年累计认定高层次专业人才3033人。2013年深圳新引进“海归”人才接近5万人，76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其中，深圳虚拟大学园作为全国乃至世界唯一集成53所国内外院校资源的创新型机构，已培养本硕博学生14万人以上。深圳大学城每年培养研究生达6000多人，已成为有系统、全方位培养、引进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本土机构。

深圳相对完善的科技服务中介机构是促进创新的重要桥梁。比如， 通过在深圳建立创业板和中小板，扩大企业融资渠道；深圳高新区服务中心成立了深圳高新区创业投资服务广场，通过引进风险投资基金，券商投行部和非上市企业业务部，产权交易所，评估、会计、律师事务所及担保、信用、专利服务中介机构入驻，为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中小微科技企业提供“多层次、立体化、全过程”融资服务。

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是深圳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过程内在技术的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权益分配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需要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因此，后发国家或地区，政府可通过政策规划、政府采购、财政金融等多种形式来影响、引导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与效率。深圳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无形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深圳奖励企业技术开发人员暂行办法》、《深圳市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提取和使用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等法规条例，编制了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发展规划以及未来产业发展政策等。深圳市政府还出资30亿元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解决种子期、初创期企业融资困难问题。深圳还设立了战略新兴产业专项资金，政府对生物、互联网、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给予支持，通过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杠杆作用，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全社会研发创新领域中来。

为了保持未来深圳“创新驱动”的增长，深圳提出要以法治化、国际化推动市场化改革，建立起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创新活动的激励机制。深圳提出以打造“深圳质量”为引领，继续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加强自主研发、实施质量优先来提升品牌价值，推动深圳产业的持续升级发展。深圳要在科技领域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体制机制建设，通过创新产学研的合作模式，构建开放型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创新体系。为此，深圳提出要建设一流的人才教育培养体系，支持相关教育专业设置和基础研究设施建设，提升专业人才培养、基础性研究、原始创新水平。

三、深圳转型升级的理论总结

从深圳转型升级的路径看，深圳不仅重视产业分工深化中所体现的市场自我发育过程，也强调推动政府政策鼓励支持企业不自觉的分工专业化的创新过程，通过构建一个适于企业创新与学习的环境，实现产业持续跨越性升级。从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专业化劳动力增加及分工深化形成了深圳产业持续跨越性升级的基础，从而实现了产业内的规模收益递增；包括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和创新体系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则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推动了转型升级。由此可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深圳转型升级的两个轮子，是“新常态”增长的两个基本支撑。

深圳在发展的前期大致符合比较优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逻辑。改革开放之初，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深圳依靠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通过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和依赖模仿创新，实现了经济起飞和追随。其中，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干中学”机制、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内生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这也为深圳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变的经验所证实。但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往往从事的是相对成本较低的模仿创新，而不是发达地区的原始技术创新。

为什么深圳会出现从模仿创新向源头创新转变？这就要回到斯密的分工理论来解释。根据斯密的理论，分工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种分工的作用不仅是指内部技术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也包括了行业内部分工、不同产业部门分工以及国际分工所带来的产品和迂回生产过程增加，从而拉动经济规模的扩大。深圳经验的理论逻辑在于，通过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深圳获得了外商投资和技术许可方式的知识外溢和扩散，通过“引进—学习—改进—创新”的模式，深圳本土企业逐步形成了从工艺性技术、产业制造技术再到创新性技术的专业化劳动力队伍，这些专业化劳动力在随后的追随和赶超阶段进行模仿创新和原创性创新，又形成新的专业化劳动力种类，随着专业化劳动力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加，内生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细化，这些细分行业和产业将会聚集更多的企业，使市场竞争和创新活动更加活跃，从而可能促使新产业的形成和完善，拉动经济增长。这个理论解释对内生增长理论的扩展在于，不同于后者人力资本的同质性，本文所称的专业化劳动力的差异性将使得落后地区具备了在某些新兴产业领域的比较优势，从而可以实现跨越静态比较优势的规模收益递增的赶超发展。

如何打破斯密定理中“分工受限于市场范围”的命题？其答案在于建立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这意味着市场扩展和劳动分工的深化，要求一个由具备有效激励的企业构成的市场经济，同时需要法制化对产权以及契约缔结和履行的保障，而这些都是为了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扩大潜在的市场范围。深圳通过在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和创新体系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切实降低了企业及其专业化劳动力学习与创新的成本，促进了分工的深化与细化，从而推动深圳的产业持续性跨越升级。市场化、法制化和构建创新体系等制度创新是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基础保障。

The Path and Support of New Normal Growth: Case of Shenzhen’s Transformation of Growth Pattern

Tang Jie

（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Tianjin,300071）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henzhen’s experience of "new normal" growth has made two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including speci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henzhen realize a successful and leaping upgrade of the industries by a path of processing-manufacturing-innovation,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Shenzhen not only respected the law of industrial division and deepening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 self-development, but also attach importance to build up a good environment of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for enterprises, by the government’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enterprise specialized division of the innovation process and the industry upgrading.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

[参考文献]

[1] 唐杰、戴群、李战杰等. 深圳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J].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10（1）.

[2] 巴罗，萨拉伊马丁. 经济增长[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 亚当•斯密. 国富论[M]. 上海三联书店，2009.